

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5.6009

“慈爱而可怕”：鲁迅作品中寡母形象 及其寡母心态

邬文博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寡母形象的反复出现是鲁迅创作中的重要现象，亦是进入其精神世界的一个特殊入口。鲁迅的思想资源源于集体无意识、中国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学以及其个人经验等等。鲁迅作品中塑造的寡母形象，既具备母亲原型慈爱而可怕的矛盾属性，又融入了其对现实中寡母生存处境的思考——她们居于社会底层，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贞节困境。实际上，鲁迅本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寡母抚孤的心态来对待青年的，其具体表现为他早期之青年观的理想化倾向、自我的“罪感”意识，以及他后期之青年观看似“颓败”、实则依旧有强大的母性支撑之事实。通过对鲁迅文学文本中寡母形象和个人寡母心态之间的互文性理解，可为常规理解中作为“父亲”形象出现的鲁迅形象补充其同时身为“母亲”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鲁迅；寡母形象；母亲原型；寡母心态；青年观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5)06-0083-08

“Loving and Formidable”: The Image of Widowed Mothers in Lu Xun’s Works and His Widowed-Mother Mentality

WU Wenb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The recurrent depiction of widowed-mother images is a significant phenomenon in Lu Xun's creations and serves as an entry point into his spiritual world. Lu Xun's ideological resources stem from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the May Fourth New Literature, and his personal experiences, among others. The widowed mothers portrayed in Lu Xun's works embody the contradictory attributes of mother archetype—both loving and formidable, but also incorporating his reflections on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widowed mothers in reality. They reside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 facing immense survival pressures and moral dilemmas of chastity. In fact, Lu Xun himself, to a large extent, approached youth with the mindset of a widowed mother raising an orphan, manifested in the idealistic tendencies of his early views on youth, his self-imposed sense of “guilt”, and the seemingly “decadent” yet still strongly maternally supported perspective on youth in his later years. Through an intertextual understanding of the widowed mother figures in Lu Xun's literary texts and his

收稿日期：2025-06-30

基金项目：陕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项目“学科建设背景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研究”(SXGERC2023050)
作者简介：邬文博，女，内蒙古包头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personal widowed-mother mentality, we can supplement the conventional image of Lu Xun as a “father” figure with an equally important dimension of him as a “mother”.

Keywords: Lu Xun; image of widowed mothers; mother archetype; widowed-mother mentality; youth view

鲁迅对女性群体的持续关注和反复书写反映了他的现代性别意识和对社会的高度关切，“鲁迅与女性”也成了研究者不断言说的主题。这既显示出鲁迅作品的恒久魅力和鲁迅研究的巨大活力，也暗示着这一“陈旧”的话题已逐渐形成一种思维定势，难出新意；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鲁迅笔下的女性形象群进行整体性观照、进一步挖掘“鲁迅与女性”这一话题的阐释空间已经毫无可能和意义。比如，他笔下的寡母形象谱系就甚少为研究者所注意，这当中包括狂人母亲、夏四奶奶、单四嫂子、九斤老太、八一嫂、吴妈、祥林嫂、吕纬甫母亲、魏连殳祖母、眉间尺母亲、《补天》中的女娲以及《颓败线的颤动》中的老妇人等，还有他身边的祖母蒋菊花、母亲鲁瑞、阿长、杨荫榆、衍太太等。虽说相关研究的数量已相当庞大，但明确聚焦于“寡母”身份的研究却不多。已有研究或从阶级分析视角出发理解其社会意义，视之为封建社会中妇女生存困境的真实写照^[1]；或意图通过寡母形象探究鲁迅的创作心态，却仅止于五四一代共同的“为人生”理想这一浅显层面^[2]。即便有研究者意识到寡母身份的特殊性，也多是将鲁迅其人与其寡母书写置于“寡母抚孤”的历史文化现象和文学史脉络中，分析现代作家普遍的创作心态及背后的文化意蕴^[3-4]，而往往忽视、掩盖鲁迅的个性。应该说，鲁迅笔下的寡母形象，既因承受着更为沉重的“历史罪”而区别于子君或爱姑等女性形象，又因他独特的思想资源和生命体验的融入而区别于同时代作家笔下的寡母形象。其不仅作为“个”，具有独特文化意蕴，更作为“群”，蕴含着历史文化层面和鲁迅个人层面的丰富信息。因此，有必要对其展开系统性考察，以更深入地探寻鲁迅的精神世界。

一、寡母形象生成的多维思想资源

通常在考察鲁迅作品中某个寡母形象的生成时，研究者多从“杂取种种，合成一个”的人物

塑造策略入手，分析鲁迅如何将特定的人与事融入其中。而如果将视野放宽至寡母形象群，不难发现，其生成必然超越具体的人与事，是鲁迅多维思想资源聚合的结果。应该说，除了中国文学传统、五四新文学和鲁迅个人的身世经验等有迹可循的意识层面因素，潜藏于民族心理结构中的母亲原型也在无形之中发挥着其强大的影响力量。意识与无意识的交织、转化和共同作用，催生了鲁迅创作中的寡母形象，并令其在鲁迅塑造的众多形象中释放出别样光彩。

首先，从人类心灵史的宏观视域来看，鲁迅作品中的寡母形象是人类集体无意识中母亲原型在文学创作中的投射。荣格认为，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主要内容，“它指出了精神中各种确定形式的存在，这些形式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普遍地存在着”^{[5]61}。母亲原型作为其中一个概念，指一种超越所有现象的母亲的原型或原始意象，是人类集体无意识中最古老的“童年记忆”，个人的母亲、祖母、继母和岳母，以及与之存在关系的护士或家庭女教师，还有遥远的女性祖先、女神等都是其具体呈现。母亲原型通常和象征着丰饶、多产的事物，以及具有包容、守护内涵的容器等相关联；天堂、天国和圣城等作为母亲原型的象征，隐喻着我们渴望获得救赎。总体上，这些象征既可能具有积极良好的一面，也可能具有消极邪恶的一面：“与此相关的品质有母性关怀和同情、女性的神奇权威、超越理性的智慧和精神兴奋、一切有益的本能和冲动，所有善良、珍惜、延续、促进生长和繁殖的特征……消极方面，母亲原型可能意味着一切秘密、隐藏、阴暗的事物；深渊，死亡世界，一切吞噬、诱惑、毒害、像命运一样恐怖而无法避免的事物。”^{[6]13-14} 荣格将其概括为“慈爱而可怕的母亲”。人类心理结构中对母亲矛盾特质的认知，使之相应地形成了崇拜和畏惧母亲的矛盾心理，而母亲原型之所以在鲁迅的创作中被凝结为寡母意象，与原型自身的特性和鲁

迅个人的意识作用有关。原型作为人类心理结构中一种不可描述的因素，其在无意识中处于混淆、互渗的状态，可以由诸种象征组成一组象征群。当主体有意识地将象征群予以分化时，这种混淆就会逐渐减弱。寡母是母亲原型的象征之一，当鲁迅将特定的社会文化因素和个人体验注入其中，其便具备了与母亲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复杂意涵。

其次，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存在一个寡母形象谱系，鲁迅实则接续了这一文学传统。其最早可追溯至上古神话中的女神，典籍中记载了她们感应受孕、造人补天等事迹，如华胥履大迹于雷泽生伏羲、简狄吞鸟卵而生契、姜嫄踩巨人足迹而生后稷，女娲身上更是集中了炼石补天、积灰治水、造人化物、至德善治等功绩。女神创生万物的始祖母神格和拯救苍生的英雄神格，反映了在“知母不知父”的母系社会阶段先民的母神崇拜情结。但从《诗·大雅·生民》中生下后稷并三次抛弃他的母亲姜嫄开始，母亲对生命的毁灭和剥夺现象亦有出现。如此，母亲就成了兼具创造性和毁灭性向度的悖论性存在。这一心理结构延及后世并影响着后人的文学创作，使得《十三经》、汉乐府、元杂剧、明清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寡母形象。她们勤劳、聪慧、善良且富于牺牲精神，与儿女（通常是儿子）相依为命并将自己的个体人格投注到儿女身上，如《红楼梦》中的李纨；同时她们有着极高的女性权威，经常与作为男权代表的儿子产生冲突，如《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的武姜、《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等等。

再次，在五四时期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寡母形象的集中涌现成为新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现象，鲁迅亦属其中一员。台静农《红灯》中的得银娘、凌叔华《杨妈》中的杨妈、柔石《遗嘱》中的老寡妇、许地山《万物之母》中的敬姑、蹇先艾《水葬》中骆毛的母亲、许钦文《疯妇》中的双喜娘等都是五四新文学中寡母形象的典型。这些寡母形象作为五四时期对母系社会母亲原型的重新召唤，其前提是五四新文学对“人”的发现，其根本指向则是近代以启蒙和救亡为主线的社会现实。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谈到“人”的真理的发现时指出，“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主张“男女两本位的平等”，排斥殉节、守节这

类非人道的习俗^[7]。在当时反封建家长专制的思想启蒙浪潮中，失却精神之父的启蒙精英，急切地寻找到来作为新的精神补偿和支撑力量，加之鲁迅、胡适、茅盾、老舍等新文学作家普遍由寡母抚养长大，由此，一代作家纷纷将目光投注到在社会性别秩序和女性群体中均居于底层的寡母身上，通过对她们的生存境况和不幸命运的书写，批判造成这些悲剧的社会和思想根源，从而廓清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同时，对于男作家而言：“母亲象征着他还没有经历过的某种陌生事物，这种事物充满了潜藏在潜意识中的意象……母亲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符号意义，这大概可以解释他将母亲理想化的强烈倾向。”^{[6]51-52}他们怀着强烈的同情和敬意，书写女性慈爱、坚韧、勤劳等美好品质，在母亲身上寄托关于新式女性道德的期待和想象，意图以伦理之觉悟推动国家、社会和群体的改造和更新。

鲁迅本人亦是寡母抚养长大的孤子，这一身世使他对寡母的形象认知和情感态度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双向度特点。一方面，关于祖母、母亲和阿长的记忆构成了他天真童年时代的重要部分，他在《狗·猫·鼠》《社戏》《故乡》《阿长与〈山海经〉》等文本中均以充满温情的笔触描绘寡母的形象。日后的他在长期的战斗中屡屡失望，一度陷入“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的绝望情绪中时，童年便成为他时时反顾的精神原乡，寡母之爱亦带给他莫大的情感抚慰。另一方面，鲁迅又深感“母爱差不多是伟大而盲目的”。他虽在理智上秉持五四一代“无恩有爱”的新式亲子伦理观，但在面对母亲时，他的伦理观中“传统”与“现代”的不相协调以及前者巨大的情感力量便显现出来，以“恩”“孝”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依旧主导着他对母子关系的认知并严格规范着他的行为，尤其是长子的身份又带给他较其他弟兄更为强烈的责任意识和牺牲精神。因此，他不愿看到母亲失望，不去忤逆母亲的意愿，这在他的婚姻问题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寡母之爱也会成为战士前行和战斗的负累。当鲁迅追求“过客”式的反抗绝望时，他也忧心，但这种反抗，每每容易蹉跎在“爱”——感激也在内——里。在致赵其文的信中，他袒露了自己关于感激母亲与决绝战斗的矛盾心境：“感激，那不待言，无

论从那一方面说起来，大概总算是美德罢。但我总觉得这是束缚人的……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8]477}在投身革命和体谅慈母的两难境地中，鲁迅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9]

二、寡母形象中母亲原型与现实因素的交错

总体上，鲁迅创作中的寡母形象既契合母亲原型兼具孕育、滋养、保护与吞噬、阉割、毁灭等两重性的矛盾品质，又折射出近代乃至几千年来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渗透着他关于民族历史、社会现实和女性命运的整体性思考，成为无意识与意识、艺术与现实交错共生的复杂存在。

鲁迅首先通过重写神话来张扬女性化育万物的创生本质，《补天》正是他对女娲造人传说的诗意化重构。小说“取了茀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10]，以象征手法表明生命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亦是人类的根底。故事开篇，女娲从沉睡中清醒，周遭寂静无声，眼前是远古时期混沌、朦胧、色彩斑斓的景致，天地间形成一种生机勃发之势，女娲也因积蓄满溢的生命力无可排遣而感到懊恼、无聊，性的压抑和生命的苦闷促使她起身造人。鲁迅以极其浪漫、绚丽的笔触描绘了这一宏大而神圣的场面，女娲的生命力如浪花般激荡、昂扬，与周围生气弥漫的原始背景构成浑然一体的和谐状态，人类于此际诞生并带给她前所未有的愉快。如果说从神话中汲取理想和意愿来重建文化，是各民族文化建设的捷径之一，那么鲁迅将人的本能欲望与神圣的女娲造人传说相结合，不仅一改中国神话中女神无性而孕的传统，超越了封建礼教对女性/女神的道德规范，更将孕育生命上升为一项兼具神性与人性的崇高事业，具有以五四“灵肉一致”的新道德冲击和重塑旧道德的深刻意义。

鲁迅还着重表现了寡母对子辈的天性之爱以及子辈的敬与孝，他也没有回避寡母之爱和战士使命之间的矛盾并提出了解决策略。《明天》中，单四嫂子为了生计深更半夜也不停歇地纺纱，懂事的宝儿也想通过卖馄饨减轻母亲的负担；《在

酒楼上》中，吕纬甫为了母亲不得已回乡迁坟；《孤独者》中，魏连殳一领到薪水立即寄给祖母，绝不拖延。《药》则展示了革命者与寡母之间无可避免的矛盾。应该说，夏瑜弥补了鲁迅未能投身革命的遗憾。在对夏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精神致以敬意的同时，鲁迅也清醒地指出他终将牺牲且“被吃”的不幸结局。与夏瑜在狱中仍坚持启蒙姿态相对的是，失去孤子的夏四奶奶头发半白、衣衫褴褛、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三步一歇的老态。结尾处鲁迅“听将令”而用“曲笔”为夏瑜坟上平添的一圈红白的花，作为小说整体阴暗色调里仅有的亮色，亦是他给失子寡母的些许慰藉。直到《铸剑》，鲁迅才提出了平衡母爱重担和战斗使命的设想：眉间尺生来为父报仇的使命，使得母亲传达给他的不是爱的信息而是绝不妥协的恨，因此，他将对母亲的热爱全都倾注到对仇人的憎恨当中，即“爱即为报复所爱者仇恨对象乐于做出的牺牲”^[11]。

因对于寡母吞噬生命的毁灭属性保持着相当警惕，鲁迅还激烈地批判了衍太太和杨荫榆假借“爱”之名对孩童实行的凌虐。衍太太是乡村社会中那类损人不利己、好散播流言的妇女的典型，《琐记》中记载了她怂恿小孩子冬天“吃冰”“打旋子”、给年幼的鲁迅看春宫图、唆使他偷盗母亲的首饰拿去变卖并散布流言污蔑他等恶行。最终，衍太太迫使他不得不“走异路，逃异地”。鲁迅幼时眼中衍太太的鼓励和关爱，后知后觉是放纵和损害，这导致他认知崩塌和终生难忘的情感创伤。因其所作所为与五四时期的儿童本位观相冲突，鲁迅一反常态地以衍太太这一带有鄙视色彩的称呼，讽刺她与侄子周生的不伦情感。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则是那类“不得已而抱独身主义”的“拟寡妇”，她长久以来因性欲受压抑导致精神上的执拗和猜疑，“见一封信，疑心是情书了；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12]281}，这与阿Q“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12]525}的变态心理如出一辙。她所实行的“寡妇主义”教育只能使青年阴沉、萎缩，因此鲁迅急切地呼唤教育界对此进行补救。

除了在母子亲情框架内通过子辈视角呈现寡

母身上的矛盾特质外，鲁迅还以“局外人”的眼光剖析寡母在整个社会乃至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及其面临的困境。就社会地位而言，现实中的寡母是乡土社会中孤独的边缘人，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从姓名中就透露出她们无名的生存状态：她们或从夫姓，或从夫名，或仅作为一个没有名字的祖母、母亲而存在。鲁迅如此营构小说中寡母的名字显然是经过周密思考的。在其笔下，与女性的无名相对的是男性不仅有名有姓，不少还冠之以表示尊贵地位的“爷”。这意味着男性是独立且拥有权力的个体，女性则只能麻木地处于顺从和依附地位。除了受制于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当作为弱者的女性“抽刃向更弱者”时，寡妇依旧是她们欺压的对象，譬如祥林嫂之于柳妈、八一嫂之于七斤嫂。无名的生存结果必然要做无名的牺牲，但她们依然凭借强烈的求生本能艰难地生存，彰显出女性强大的生命力。

鲁迅尤为重视女性解放所需的经济前提。对于既无所依附又缺乏文化学识或一技之长的寡妇来说，只有依靠辛勤劳作或出卖身体才能勉强维持生计。单四嫂子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感受到安宁和幸福，祥林嫂因其勤劳为乡村共同体接纳后也感受到满足，而《颓败线的颤动》老妇人沦落为妓也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即便能够勉强生存，她们仍是弗莱意义上的典型的悲剧主人公，“虽竭力想成为某个社会群体的一员，最终仍被社会抛弃出去”，表现出“严峻的社会道德对个人经历施加的约束”^[13]。这在祥林嫂两次参与祭祀的对比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参与祭祀意味着她还是因祭祀关系构成的强固的单位集合体中的一员，带给她一种同周围人一样正常生活的实感，但当她因寡妇再嫁被排斥在外时，她就面临着作为寡妇生活艰难的同时还面临着贞节难题。“不节烈”的祥林嫂被乡村共同体驱逐后在孤独中死去。选择节烈的单四嫂子除了生存的压力和看客的眼光，还需忍受性欲的压抑，警惕周围无赖流氓破坏节烈的可能。小说中，红鼻子老拱的偷听、蓝皮阿五借机揩油的“帮忙”、他们喝酒唱曲时表露的邪念，暗示着预计做无名牺牲的寡妇很可能是欲做奴隶而不得。包括在阿Q眼中的小尼姑和吴妈，也只是他运用“精神胜利法”和发泄性欲的对象，他反复哼唱的《小孤孀上坟》也说明寡妇

的痛苦只是他人把玩的乐趣。借此，鲁迅揭示出中国两性文化中一个隐蔽的特点：“通过贞节观念实现对丧夫的女人身体的囚禁，却又使她们变成人人均可窥视、亵玩的对象；在锁闭最严的地方，恰是欲望窥视最集中的地方。”^[14]

鲁迅作品中的寡母，为了下一代的生存和成长可以毫不吝啬地牺牲自己，但以贞节为主的封建女性道德观会侵蚀乃至压倒子辈对寡母最原初的情感。在《补天》和《颓败线的颤动》中，先驱者为群体的利益被杀掉或放逐这一原型，分别以神话和梦境的形式在母子身上显现。《补天》中，当女娲在天崩地塌之际再次醒来，此时衣饰和语言的差异象征着人神之间已存在话语系统及价值观念上的隔膜，但她依旧打定将天修补起来的主意，即便是无聊、孤独地从事这一事业并遭遇冷笑和痛骂。讽刺的是，这不仅招来了“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的指责，人类还在她死后打着“嫡系”的旗号利用她的尸体。小说中出现在女娲两腿之间的小人物，表征了寡母因不合乎女性道德而被子辈指责和背叛的残酷现实。其插入不仅毁坏了鲁迅原本构思的宏大结构，还以畸形的女性道德观破坏了小说上半部分女娲造人故事所张扬的崇高母性。这种文本内部的裂隙，更能凸显出先驱者命运的悲剧性和鲁迅的批判力度。《颓败线的颤动》中，老妇人因不守贞节受到女儿和女婿的指责，连“最小的一个”也叫嚣着“杀”，牺牲者被放逐的悲剧命运因发生在家庭内部而更使人恐惧和同情。被遗弃的她选择遗弃过往，继而说出“无词的言语”。钱理群将“无词的言语”视为鲁迅作为异端知识分子的言说困境^[15]。如果不从隐喻意义而从文本本身出发理解，这也是不节烈的寡妇自我表达和价值判断的困境。她们无法用体系中的任何语言来表达和评判自己，但又置身于社会之中，一开口就有可能落入社会既有的经验、逻辑与言语之中，从而陷入“失语”状态。只有她赤身裸体，摒弃人类的语言及其所有价值，返还生命的原初状态，才获得了充盈天地的生命能量，仇恨也随之平复和消解。

三、寡母心态与鲁迅青年观的形成和“颓败”

端木蕻良忆及萧红和鲁迅的交往时，记录了这样一段二人之间的对话。萧红询问鲁迅：“您对

青年们的感情，是父性的呢？还是母性的？”鲁迅沉吟片刻后道：“我想，我对青年的态度，是‘母性’的吧！”^[16]如果说“孤寂意识赋予了鲁迅对自身孤寂命运及复杂思想的清醒的自觉”^[17]，那么可以更进一步认为，他是以寡母抚孤的心态对待青年的。寡母孤独的生存状态和抚育孤子时的无所依靠的心理状态更贴近鲁迅的孤寂意识，也更契合他以孩子为全部希望的进化期待和为了孩子不惜献出自己的牺牲精神。荣格认为，原型复活后，会“产生出一种强制性，并像一种本能驱力一样，与一切理智和意志相对抗”^{[5][67]}。鲁迅身上的“母性”一经激活，便成为他生命及思想中一以贯之的内容，在一次次的“崩塌”和重建中显示出其压倒性的影响。

在早先“立人”“立国”及“立家”的政治文化策略建构中，鲁迅展开了对青年的想象，其中“立家”催生了他的“母性”。早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就在民族国家的视野下关注和思考青年问题，并将自身的政治文化追求投射、寄托于青年，赋予其“政治新主体”的希望。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也遵循此逻辑，旨在创造“新青年”，从而以其“根本之觉悟”更新国家政治。彼时，鲁迅又进一步提出“立家”为实现“立人”和“立国”提供可行路径的观点。他将“救救孩子”具体落实到作为社会结构中最小单位的家庭层面，视家庭伦理的变革为青年解放的先决条件；而除了“个人的小家”，“众人的大家，包括民族形成的国家，以及人类赖以存在的精神家园”，均为“立家”之说的题中应有之义^[18]。鲁迅指出不同层面的“家”所共享的进化途中新陈代谢的更新规律，还明确要求父亲（其实也包括母亲）树立起“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的自觉意识，明晰自己在进化链条上的“中间物”位置，承担起“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12][135]}的历史责任。不难发现，“立家”说带有浓厚的感性色彩。鲁迅在主张“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12][168]}时，未必没有想到母亲给自己造成的遗憾。“立家”也为鲁迅的青年观融入了一定的感性因素，他不自觉地将公共领域的先觉者与后来者的政治关系，转化为私人领域的父母与子女的家庭关系。他不仅“为父”的自我主体意识

觉醒了，根植于其精神深处的“母性”也被激活了，并由此开启了他寡母式的牺牲命运。

20世纪20年代，逐渐成为思想界领袖的鲁迅与青年交往颇为密切，寡母抚孤心态的代入使他形成了一种以孩子为指望的生活方式以及高度理想化的青年观。虽说此时鲁迅已不再视青年为一个笼统、抽象、个体面目模糊的政治符号，意识到青年不可一概而论，但他仍将希望寄托于那些“要前进的”青年，鼓励他们大胆说话、勇敢前行，毫无忌惮地站出来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肩负起扫荡吃人的宴席、“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12][225]}的使命。这种对于青年近乎完美的想象固然是早期进化论思维的延续，也与鲁迅借助“身外的青春”走出“第二次绝望”的现实经验不无关系。因此，鲁迅异常珍视这些进步的青年，欣赏他们的幼稚。不过，在他身上也体现出一个慈母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希望看到青年充满热血和激情、不顾个人安危的勇猛；另一方面，但又非常害怕青年因为这份勇猛而牺牲。”^[19]更为重要的是，他想尽力避免自己未成熟的果实毒害那些偏爱自己的青年。

在进化论思维作用下，鲁迅尊崇青年的同时，也表现出强烈的自我否定意识。丸尾常喜认为鲁迅的进化论有三层含义：“否定旧社会传统的‘传统否定’，否定被这一传统所养育、侵蚀的自己的‘自我否定’，为了拯救尚未被侵蚀的孩子、自愿地奉献出自己的生命的‘自我牺牲’。”^{[20][296-297]}且他认为，是鲁迅作为传统之子的“耻”意识支撑起其“自我牺牲”精神的。究其实质，鲁迅无从祛除的灵魂重负更接近竹内好所言的“罪感”而非“耻感”。二者的区别在于：“罪”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负疚和自责，往往导致自我惩罚的冲动，能以赎罪的方式获得救赎；“耻”更强调外在社会道德、社会群体对个人的约束和评价，个人的某些行为可能无法通过忏悔、赎罪而得到解脱。生长于传统社会、受传统文化的习染是鲁迅的“原罪”，而肩起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的地方正是他“赎罪”的方式。“耻”应该是寡母最为深切的感受，失节对她们而言是莫大的耻辱，即便她们对子女施以纯洁的天性之爱并为之牺牲，依然因此招致周围人（包括子辈）的指责而难以解脱。《颓败线的颤动》中老妇人被子女放逐的命运，亦是鲁

迅“赎罪”无效的自我预言和现实结局。由此，鲁迅的“罪”与寡妇之“耻”之间得以贯通，这也就理解为何他会“对男权文化挤压下的‘失节’妇女表现出深切的自我情感认同”^[21]。

在现实中，鲁迅献出一切的牺牲却招致了青年的不满和背叛。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坦言自己的心态变化：“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除掉那一个人之外。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这实在使我愤怒。”^{[8][657]}这正是一种类似于《补天》和《颓败线的颤动》中寡母被子辈所抛弃和放逐后的心态。因鲁迅思想中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不断地起伏消长，他青年观中隐含的“颓败”危机屡次浮现出来。早在“彷徨”时期，鲁迅反复书写的幼儿挥着芦叶喊“杀”的情节，以及魏连殳和“我”关于孩子的辩论，就已经显示出他青年观中难以调和的内在冲突和激烈、痛苦的自我搏斗。1926年，莽原社成员因“压稿”问题发生冲突，鲁迅发现，作为知识青年批判社会的阵地反倒成了青年互相争夺的地盘，他下定决心以后“虽是什么青年，我也不再留情面”。紧接着广州“四一五”大屠杀发生，目睹了青年内部的分化和互戕后，鲁迅不再“只信进化论”，

“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22]。1928年，鲁迅又受到冯乃超、李初梨、成仿吾等人的无端攻击。早在厦门大学期间他就有同创造社联络起来向旧社会进攻的想法，还一度认为与其“感情似乎很好”，不料反受其攻击。20世纪30年代后，鲁迅对青年的失望情绪和批判力度更加强烈，日益流露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23]的颓唐情绪。

表面上，鲁迅的青年观发生了彻底转变，实则他对青年的失望和疑惧根植于他的天性之爱，特别是母性之爱。鲁迅很早就产生“人在天性上不能没有憎，而这憎，又或根于更广大的爱”^[24]的感受，爱与恨、牺牲与复仇彼此纠缠、转化也成为他此后不断强化的人生体会。鲁迅正是在一次次失望中反复地激活、强化自身的母性之爱，以平复、消解他对青年的仇恨，并在爱与憎的相互搏斗中不断地汲取求生的欲望和行动的力量。当

《颓败线的颤动》中老妇人对天说出无词的言语时，她的身躯与天空一同颤动。“这个意象让我们感到溶解并且重铸已动摇的‘进化论’的巨大能量，也让我们预感到鲁迅身上新的‘母性’的复活”^{[20][354]}，他选择“将一切忘却，休息一时之后，从新再来，即使明知道后来的运命未必会胜于过去”^{[8][92]}。莽原社“压稿”冲突前后，鲁迅不仅在《铸剑》中设想了与青年知识分子“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的理想关系，还试图通过将青年区分为“真有几分为社会的”有希望的青年和“做文章的”“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以重振对青年的信心；在公共场合，他仍鼓励青年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在被创造社和太阳社攻击后，考虑到中国“可作梯子者”寥寥，鲁迅依然参与筹建左联。“梯子论”意象作为“中间物”意识的一种表征，足以证明进化论并未从他的思想结构中消失殆尽。生命末期，面对疾病和死亡的威胁，鲁迅与“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25][487-488]}的珂勒惠支产生强烈的精神共鸣，珂勒惠支作品中那些“脸上虽有憎恶和愤怒，而更多的是慈爱和悲悯”的“一切‘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母亲的心的图像”^{[25][518]}，亦是他的自我画像。他精神深处的母性再次得以熔铸，继而迸发出强大的求生意志，感受到与“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的联结，产生了切实的生存感受和求生的欲望。凡此种种，可见母性对于失落后的鲁迅重新追寻、聚合自我，具有何其强大的驱动力量。

钱理群指出：“我们往往注目于愤怒的鲁迅，却忽略了鲁迅悲悯和慈爱的这一面。”^[26]寡母形象为了解鲁迅这不为人注意的一面提供了一条“人”与“文”互释的通道，勾连起人类集体无意识、民族历史、社会现实以及鲁迅个人的体验和思考。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寡母不仅契合荣格意义上母亲原型“慈爱而可怕”的双重属性，也与鲁迅眼中“伟大而盲目”的母爱、“仁厚黑暗的地母”形象相一致。虽然鲁迅对于寡母的感性认知、寡母形象的塑造和他为寡母的心态各有其差异性特质，但三者实质是高度同构的。在学界较多关注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亲子伦理观、鲁迅的“父亲情结”及他的儿童观、教子观等，侧重呈现“父亲”

鲁迅形象的情况下，通过对鲁迅文本中寡母形象和他个人寡母心态的系统分析，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鲁迅父性与母性兼备又高度融合的伟人品格。

参考文献：

- [1] 杨为伟.论鲁迅小说寡妇形象的社会意义 [J].上饶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6, 6(2): 81-85.
- [2] 徐健.走进鲁迅的小说世界 [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2: 113-118.
- [3] 谢泳.“寡母抚孤”现象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对胡适、鲁迅、茅盾、老舍童年经历的一种理解 [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2(3): 205-212.
- [4] 翟瑞青, 孟繁兵.“寡母抚孤”文学现象背后的文化意蕴 [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 49(2): 75-77.
- [5]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 [M].冯川, 苏克, 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
- [6] 荣格.四种原型 [M].中央编译翻译服务组, 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23.
- [7] 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 [M].钟叔河, 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86-90.
- [8] 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9] 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4.
- [10] 鲁迅.鲁迅全集:第2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353.
- [11] 路文彬.论鲁迅《铸剑》中的复仇之恶 [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5(12): 128.
- [12]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13] 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 [M].陈慧, 袁宪军, 吴伟仁, 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56.
- [14] 唐利群.《阿Q正传》与中国两性文化 [J].鲁迅研究月刊, 2000(5): 35.
- [15] 钱理群.我与《颓败线的颤动》的迟迟结缘 [J].名作欣赏, 2019(10): 11.
- [16] 端木蕻良.鲁迅先生和萧红二三事 [J].新文学史料, 1981(3): 69.
- [17] 于浩男.孤寂意识:鲁迅思想的原点 [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8(2): 102.
- [18] 李继凯.略论鲁迅的“新三立”和“不朽” [J].鲁迅研究月刊, 2013(9): 6.
- [19] 阎晶明.鲁迅还在 [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286.
- [20] 丸尾常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 [M].秦弓,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 [21] 吴敏.试论鲁迅的女性观 [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6): 36.
- [22]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5.
- [23] 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405.
- [24] 鲁迅.鲁迅全集:第10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192.
- [25]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26] 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之二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17.

责任编辑: 黄声波